

清朝中后期史料中的新加坡与华侨华人

唐彦超

(中共茂名市电白区委党校, 广东 茂名 525400)

[摘要] 清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加深,中国与海外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位于东南亚且地理位置重要的新加坡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的重点关注对象。对于新加坡地理方位的记载、英国殖民当局对新加坡的统治、在新华侨华人的生活状况、晚清中国官方与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及双方交涉等多方面成为清朝中后期新加坡相关史料的重点记录内容。

[关键词] 清朝中后期;史料;新加坡;华侨华人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22)02-0015-10

一、新加坡华侨华人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新加坡华侨华人的相关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以下将对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清朝尤其是晚清时期的新加坡华侨华人的主要研究成果作出必要的总结与梳理,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有关新加坡华人社会历史变迁方面:黄松赞的《试论新马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历史分期》分析了近代新马华侨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从经济、社团、文教、领袖及与中国的关系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①。林远辉、张应龙合著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从历史学角度全面阐述了新加坡独立建国前华人的移民过程、华人社会各个方面的具体状况和当地华侨与中国的关系^②。二是有关新加坡华人社团研究方面:邱格屏先后发表了《19世纪新马华人的职业垄断与会党械斗》^③、《19世纪新马华人秘密会党与猪仔贸易》^④、《新马早期华侨资本成长中华人秘密会党之功能》^⑤、《新马华人侨领与会党头目的依存与互动》^⑥、《新马华人秘密会党社会构成之探讨》^⑦等多篇论文,对新马华人秘密会党的组织构成、内部运作、功能结构和变迁发展等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三是有关新加坡华人宗族组织研究方面:林金枝的《新加坡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梳理了19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侨华人社团的形成、发展变化、社团类型、功能作用及发展趋势等方面内容^⑧。曾玲先后发表论文《“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

[收稿日期] 2021-11-10; [修回日期] 2021-12-24

[作者简介] 唐彦超,广东江门人,中共茂名市电白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学科教学(历史)。

①黄松赞:《试论新马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历史分期》,《东南亚研究》1981年第3期。

②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③邱格屏:《19世纪新马华人的职业垄断与会党械斗》,《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④邱格屏:《19世纪新马华人秘密会党与猪仔贸易》,《中国海洋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⑤邱格屏:《新马早期华侨资本成长中华人秘密会党之功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⑥邱格屏:《新马华人侨领与会党头目的依存与互动》,《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⑦邱格屏:《新马华人秘密会党社会构成之探讨》,《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

⑧林金枝:《新加坡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八桂侨史》1993年第4期。

人的“亲属”概念^①和《华南海外移民宗族社会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②等,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方法考察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从移民到定居的转变过程中如何重建文化家园,显示出中国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其专著《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是近年集中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著作^③。此外,孟庆梓的《近30年来中国学界新加坡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综述》对我国学界有关新加坡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总结和介绍^④。

本文以清朝中后期以来有关新加坡与华侨华人的史料为研究对象,把重点围绕在清朝时期中国人对新加坡的关注与了解、华侨赴新移民定居以及中新官方关系的建立等方面,力图展现出清朝时期中国人认识新加坡、移居新加坡和中新外交关系的发展等方面的史实,为新加坡华侨华人史的探讨和中新友好关系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努力。

中国与新加坡的交往由来已久。自19世纪早期开始,移民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对新加坡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清朝中后期的史料中,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有关新加坡的记载也逐渐增加。尤其是自晚清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一些外交官代表朝廷出使海外,他们对外国的各种见闻都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其中,对于作为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的重要基地,又是众多华侨华人聚居地的新加坡,自然是下不吝笔墨。本文将通过对清朝中后期史料的解读,尽力还原这一时期中国的旅行家、知识分子和外交官对新加坡的认识以及寓居在新加坡的华侨华人的生活状况。

从17世纪开始,英国商人就在马来亚活动。到18世纪中期,以英属印度为基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考虑到与中国贸易量的不断增加,需要在马来亚建立贸易站,修建一个可以让其商船停泊、维修的优良港口,以便在与荷兰人的贸易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经过一番挑选后,1786年,英国从吉打苏丹手中租借了檳城(华人俗称为“檳榔屿”),以其作为第一个长期基地。1819年,英国在新加坡(华人俗称为“石叻埠”)建立贸易据点,以其作为第二个长期基地。1824年3月,英荷达成了互换殖民地的协议,英国获得了马六甲(华人俗称为“吗六呷”)。8月,英国与新加坡名义上的统治者柔佛苏丹和当地的实际统治者天猛公签订条约,英国正式租借新加坡。1826年11月,英国以上述三地为基础,正式成立了海峡殖民地,由东印度公司管辖。当地华人称之为“三州府”或“叻屿呷”。1832年,新加坡成为海峡殖民地的政府所在地。1867年4月,海峡殖民地正式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位于伦敦的殖民地办公室直接管辖。

二、鸦片战争前清朝人笔下的新加坡概况

虽然英国在马来亚大肆进行殖民活动的时候,中国尚处于信息较为闭塞的“闭关锁国”状态下,但这并没有妨碍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对相关信息的获悉与收集。清朝乾隆(1736—1795年)、嘉庆(1796—1820年)年间曾游历东南亚、西欧和美国等地长达14年之久的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有“中国的马可波罗”美誉的旅行家谢清高(1765—1821年)在其1820年口述的著作《海录》中对英国人在马来亚的殖民活动做了第一手的记载,新加坡在开埠之后迅速成为英国在南洋的重要据点:“旧柔佛……嘉庆年间,英吉利于此辟展土地,招集各国商民在此贸易、耕种,而薄其赋税,以其为东西南北海道四达之区也。……番人称其地为息辣(石叻),闽粤人谓之新州府。”^⑤这是清朝的中文史料第一次对新加坡的记载。

与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谢清高不同,当时作为官僚阶层一员的萧令裕(1789—?年)则对英国在马来亚的

①曾玲:《“虚拟”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兼论海外华人的“亲属”概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②曾玲:《华南海外移民宗族社会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③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

④孟庆梓:《近30年来中国学界新加坡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综述》,《八桂侨刊》2008年第1期。

⑤谢清高:《海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页。

殖民统治更为关心。时任两广总督府幕僚的萧令裕在对广州十三行中有关中外交涉的调查中增加了对外国情况的理解。在其 1832 年成书的《英吉利说》中就谈及了英国自清朝乾隆、嘉庆以来在南亚、东南亚一带的势力膨胀,并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控制了南洋多地,形成了有效的统治:“若西南洋之印度及南洋濒海诸市埠与南海中岛屿,向为西洋各国所据者,英夷皆以兵争之而分其利,乾隆末已雄海外,嘉庆中益强大,凡所夺之地……曰旧柔佛,曰麻六甲,此二地今为新嘉坡,此皆南洋濒海之市埠也;曰新埠……此皆海中岛屿也……”^①萧令裕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英国人在南洋势力的逐渐坐大。

与萧令裕同时代的颜斯综在其成书于 19 世纪 30 年代的著作《南洋蠡测》中也提及了新加坡的部分情况:“南洋之间有万里长塘,俗称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平原旷野,颇有土人,并无酋长,产胡椒、沙藤。……或云此暹罗极东边境。十余年前英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招募开垦。”^②文中所说的“万里长塘”和“万里长沙”就是南中国海与南海诸岛。颜斯综指出新加坡位于南中国海的西侧,暹罗(今泰国)的东侧。此时的新加坡已经被英国人占领开垦了十余年。

谢清高、萧令裕和颜斯综虽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身处的阶级不同,但他们作为清朝封闭社会中依然有志于关心海外大势,实属是当时国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了解英国在以新加坡作为大本营建立在南洋一带的殖民地,尤其是萧令裕,他对于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十分警惕。这对于鸦片战争发生前的清朝来说是颇具预见性的。

三、鸦片战争后对新加坡进一步的认识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人从沉睡了百年的“天朝上国”梦中慢慢醒来。随着中外交往的渐趋频繁,清政府对位于中国以南的南洋大港新加坡的关注也在逐渐增多。思想家魏源(1794—1857 年)笔下的新加坡则比前人更为详细。在其 1842 年完成的名著《海国图志》中对于新加坡的地理方位、水路时间、历史由来、战略地位等均做了一定的介绍。

(一)对新加坡地理位置的认识

与前人记载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多从马来半岛出发不一样,魏源从中国出发,记录了从中国澳门到新加坡的距离:“新加坡本非国,乃斗入南海中一大峡,地方二千里,据澳门水程十更。”^③“更”是中国古代航海人士所使用的计算海上里程的单位,一更等于 60 里,这个计算海程的单位到明清时期依然被航海人士广泛使用。可知在魏源生活的年代,中国人从当时的“出洋基地”澳门出发,走约 600 里(约合 300 公里)的路程即可到达新加坡。经过英国二十多年的开发,新加坡在当时已经以富庶闻名于中国。魏源在参阅了谢清高的《海录》和当时英国人所绘制的海图后,得知了新加坡更加精确的地理方位:“英夷开辟新嘉坡,富庶闻于中国,已数十年,皆不知为古时何国,阅《海录》及英夷海图,始知即柔佛、满刺加故墟。……英夷始移其贸易于柔佛,皆暹罗之东南境,海岸相连,并非岛屿,距大屿山仅五六日程,平行数百里,斗出海中,形如箕舌,扼南洋之要冲。”^④魏源对于新加坡的认识,包括了几点,新加坡历史上是原柔佛苏丹控制的地区,目前为英国人所控制,英国人在此地有着重要的商业利益,新加坡是一个与暹罗毗邻、背靠马来半岛、扼守东南亚航运要冲的重地。中国人对于新加坡的认识表现得更为全面。

(二)有关新加坡的译名

与魏源同一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徐继畲(1795—1873 年)在其 1849 年成书的名著《瀛寰志略》中记载

^①萧令裕《英吉利说》载何新华《中文古籍中广东华侨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19 页。

^②颜斯综《南洋蠡测》载何新华《中文古籍中广东华侨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19 页。

^{③④}魏源《海国图志》卷六,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 220 页,第 220—221 页。

了新加坡的诸多译名。华人所称呼的除旧名柔佛外,还包括了“息力”“息辣”,以及英国人对新加坡的中文音译,如“生嘉坡”“新奇坡”“呈隔伯儿”等^①。

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中国打开国门、迎来巨变的前后,诸多先驱为当时尚处于信息闭塞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知识。在庞杂的新知识中,新加坡作为英国人在东南亚的殖民活动基地和华侨华人下南洋的主要聚居地,地位尤显重要。

四、清朝史料记录下英国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

上文提及,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在东南亚的大肆活动引起了当时中国清朝部分有识之士的警惕。随着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后与外国的交流增多,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英国人在以新加坡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海峽殖民地的管治模式。

(一)招募商民,开辟新港

1819年1月28日,在船长莱佛士的率领下,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登陆新加坡岛,来自中国台山的船员曹亚志成为新加坡开埠的第一人,这是新加坡建港的开始。次日,莱佛士也登岛上岸,英国正式在新加坡建立殖民统治,莱佛士成为首任新加坡总督。从此新加坡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个时间在魏源和徐继畲的著作中均记载为“嘉庆二十三年”,即农历的1818年12月。英国人在决定开辟新加坡后便“招募开垦”,招募大量的商民来建设新港。英国人在新加坡“营肆货,招商贾”,通过召集各国商民在新加坡进行贸易、耕种,而仅仅征收较低的税甚至是免税,以希望将其建设成为四通八达的东南亚商贸中心。徐继畲对英国在新加坡实行的低税或免税的优惠政策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息力……其地当南洋、小西洋之冲,为诸海国之中市。英人免税以聚商船,西洋夹板,每岁来者以数百计。闽粤贩洋之船,南洋诸国之船亦时至,帆樯林立,东西之货毕萃,为南洋西畔第一捕头,每年交易之货价数千万元。”^②1820年新加坡开始为英国产生利润。三年后,新加坡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檳城。

在徐继畲生活的年代,新加坡在英国人的优惠政策下,已俨然成为东南亚第一大商港。与其他殖民东南亚的欧洲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一样的是,英国在新加坡开埠不久后即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每艘入港商船仅征收5—10元的入港税,进口商品均免税。新加坡的自由港政策降低了贸易成本,凸显了其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优势地位,提升了商贸竞争力,因此吸引了西方国家、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等地大量的商船前往新加坡进行贸易。

为了使新加坡的自由港优势能长期稳定,英国人在新加坡配予大量的保障措施。据《海国图志》记载,英国人在新加坡“建洋楼,广衢市”,在新加坡建设房屋、市场、码头、公路等基础设施,还从国内征召了大量优良的技工在新加坡建造铸炮局、造船厂等,并派有二千名士兵驻守此地,加强新加坡的军事防御能力^③。

(二)英国对新加坡的管理

1. 了解新加坡的管理制度

对新加坡行政管理的了解,在晚清中国外交使团频繁的对外访问中逐渐增多。1883年,随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游历外国的袁祖志(1827—1898年)曾造访新加坡,回国后著有《瀛海采问纪实》。袁祖志在书中对英国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有所记录。英国在新加坡设有总督一人,其下设有海关收税,还设有巡捕厅和巡逻差人(即警察),由一个差人负责十户人家的治安,并稽查和严禁民间的私斗、赌博及其他违禁事项。在

^{①②}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③魏源:《海国图志》卷六,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0—221页。

新加坡 烟馆和酒店数目众多 ,每天仅从这两处即可收税银二千元。比烟馆和酒店数目更多的是妓院 ,税款亦更巨。而对于房产税仅征收十分之一的低税 ,其他的税收大抵如此。包括对外来商品的税收 ,“洋货每百不过抽五 ,华货则每值百抽十余元不等”^①。在英国人的管治之下 ,新加坡表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数十年以来 ,商贾云集 ,舟船辐辏 ,楼阁连亘 ,车马载道 ,遂为圣地矣。”^②

面对大量华人 ,1877年5月 ,英国设置了华民护卫司署进行管理。首任华民护卫司是被称为“中国通”的英国人毕麒麟。该机构设立的名义是为了保卫当地华侨 ,但实际上是为了管控华人的社会活动。华民护卫司署负责管理华族社群的各种问题 ,包括调停华人帮会之间的冲突和稽查“猪仔”贸易、贩卖人口、妇女沦为妓女等方面的案件 ,但获得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2. 英国与柔佛苏丹国的关系

对于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与当地统治者的关系 ,近代中国外交官也进行了记录。清朝驻德国使馆的二等参赞徐建寅(1845—1901年)在前往西欧考察海军制造技术的路上 ,于1879年途径新加坡。徐建寅清楚知道“新加坡系巫来由土番旧地 ,六十年前英国租得之 ,每年缴租价洋银一千元 ,至今不改。”^③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1838—1894年)在其1890年出访新加坡时的私人日记中有所记载 :新加坡虽然名义上属于柔佛苏丹国的领土 ,但实际上柔佛苏丹国已被荷兰所控制 ,代表柔佛苏丹管理新加坡的是地方官“天猛公” ,英国对已经成为傀儡的柔佛苏丹和天猛公依然保留他们的名号和地位 ,以避免贻人直接殖民统治的口实 ,维持英国对新加坡的统治法理^④。

(三)传播基督教 ,加强精神统治

英国外出殖民侵略 ,一种惯用的伎俩就是传播基督教 ,以达到精神层面上的统治。萧令裕指出 ,英国人在新加坡通过传播基督教 ,以对抗和分化原来马来亚传统的习俗与信仰 ,在宗教上笼络人心 :“世传英吉利辟天主教 ,今麻六甲、新嘉坡所刊书多尊信耶稣 ,殆属藩之地 ,本非英吉利部落 ,仍其旧俗 ,故有分歧抑濡染日久 ,其王亦从而和之耶。”^⑤尽管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但在新加坡并不禁止天主教 ,因此在新加坡均建有新教和天主教的教堂^⑥。

在英属时期 ,新加坡在英国的政策引导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下 ,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大港 ,奠定了后来新加坡的繁荣景象。同时 ,由于新加坡的繁荣发达和关键的地理位置 ,吸引了大量华人的到来和中国政府的关注。因此 ,新加坡在晚清史料中被提及的数量也较多 ,中国人对新加坡的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地增加和更新 ,其中便包括了大量生活在新加坡的华侨华人的情况。

五、晚清史料中的新加坡华侨华人

华人移民新加坡的历史至少不会晚于五代至两宋时期。据《南洋蠡测》记载 ,新加坡“有唐人坟墓 ,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⑦。清末民初学者梁启超(1873—1929年)认为此处所称的“唐人”即中国人或华人之意 ,并不是指唐朝人。“梁朝”所指并不具体 ,一般是指南朝的萧梁(502—557年)或五代的后梁(907—923年)。地图学专家邹代均(1854—1908年)认为是前者 ,他在其作品《西征纪程》中认为“颜斯综《南洋蠡测》

①王之春《使俄草》,载何新华《中文古籍中广东华侨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

②⑤谢清高《海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9页。

③徐建寅《欧游杂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54页。

④薛福成《薛福成日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1页。

⑥佚名《三洲游记》,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0页。

⑦颜斯综《南洋蠡测》,载何新华《中文古籍中广东华侨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云“新嘉坡有华人坟墓碑记,载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是华人之旅居此者,始实六朝”^①。“宋代咸淳”是指南宋度宗的年号,时间是1265—1274年。尽管《南洋蠡测》对于当地唐人坟墓的数量、墓碑上所记的年号是死者的生卒年还是后人立碑的时间均并没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五代到两宋约300多年的时间里,已有不少华人移民新加坡,并在死后埋葬于此。又经过元明二代,再到清朝时,华人已经成为新加坡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加坡华侨华人作为新加坡人口的主体之一,它对于新加坡的开发、经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新加坡华侨华人在人口构成、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自身的生活状况、与殖民地当局的关系、与祖籍国的关系等方面有着以下的特点:

(一)寓居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大量来自闽粤地区

福建和广东地区的华侨华人是最早出洋谋生的一批人,是华侨华人的先驱。因此早年在海外占据华侨华人人口多数的也是来自闽粤地区的华侨华人,新加坡的情况亦是如此。清朝中期以后,由于人地矛盾的逐渐增加,中国国内的生存压力高涨。近海的闽粤地区多有民众为了继续生存下去,甘心冒死出海一搏。水路并不太远的新加坡也是他们的选择之一。乾隆年间,新加坡的闽粤地区华侨华人数已经不在少数。颜斯综在《南洋蠡测》中称:“近闻已聚唐人杂番数万。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众,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乡者。此岛由外洋至粤仅七八日。”^②早年冒死出洋的华侨多是独身一人。在新加坡落地生根的华侨通过自身的奋斗,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于是就在当地购置田产、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数世相承,有在其地二百余年而不归者,率入英籍,为其管辖。”^③到了晚清时期,新加坡已有不少的华人富商,“殷实富盛之家,如潮人陈姓、黄姓,闽人余姓,皆拥资三四百万,席丰履厚,他处所未有也。”^④新加坡华商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

1876年,清朝使团副使刘锡鸿(?—1891年)在其游历新加坡时对当地人口进行了记录:“是处垦荒六十年,洋人寓此者不及二千(多由印度、锡兰来),华人则不下十万(广东五大县及新宁人共二三万,潮嘉等属共五六万,其余则闽产)。”^⑤1887年,晚清外交官李钟珪(1853—1928年)在游历新加坡时查阅了1881年的新加坡华人人数的相关数据:“查光绪七年英人所刊户口册云:福建男女二万四千九百八十一人,广州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三人,潮州二万二千六百四十四人,嘉应州六千一百七十人,琼州八千三百十九人,三州府生长之华人九千五百二十七人,不列籍之华人二百七十二名,统计八万六千六十六人。近五六年来,虽少有参差,总在八九万之间。”^⑥当时英国每年对华人课税的收入高达36万金镑,换算成白银则超过了100万两。在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俨然已经成为英属殖民地统治下的重要族群之一,为新加坡的繁荣发展和英国的税收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新加坡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坚守

尽管移民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已历数个世纪之久,但他们依然顽强地保存了自己当年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思想家王韬(1828—1897年)在其所著的《弢园文录外编》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与当地其

① 邹代均:《西征纪程》,载何新华:《中文古籍中广东华侨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② 颜斯综:《南洋蠡测》,载何新华:《中文古籍中广东华侨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9页。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106页。

④ 蔡均:《出洋琐记》,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7页。

⑤ 刘锡鸿:《英轺私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3—56页。

⑥ 李钟珪:《新嘉坡风土记》,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85页。

他民族的区别在于“所异者不过衣服饮食、文字语言尚如其旧耳。”^①

1. 风俗习俗方面

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会在他们的商铺、住宅贴上桃符,并写上汉字,以求趋吉避凶。贴桃符、写汉字在新加坡非常风行,“有中原风景”,甚至使清朝的外交官感到惊喜。1866年,清朝第一个外访使团“斌椿考察团”在历访海外十多国后到达新加坡。使团负责人斌椿(1804—1871年)在其著作《天外归帆草》中以诗记录这一景象:“片帆天际认归途,入峡旋收十幅蒲。异域也如回故里,中华风景记桃符。”^②与斌椿一同造访新加坡的张德彝(1847—1918年)记载了一次新加坡华人依照中国习俗的送葬仪式:“嗣游于市,有十余人华装,披麻戴孝;又六人各持乐器,如小鼓、小锣、喇叭等;又二人各举一棍,上披红绸,有‘永远行’三大金字,似送灵舆者。”^③护送灵柩时,披麻戴孝和以乐器奏乐随行是中国本土传统的送葬礼仪。送葬的棍披上了红绸,可见这家人是“喜丧”,即去世的老人应该是高寿离世,这也符合中国传统对于“喜丧”的操办形式。华人去世后所办丧礼依然是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坟墓碑识,却不忘本。”^④王韬感叹新加坡华人“多有自明代来此购田园、长子孙者。虽居处已二百余年,而仍服我衣冠,守我正朔,岁时祭祀,仍用汉腊”^⑤,这充分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的顽强生命力和历史传承性。

2. 文化教育方面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记载最早见于《海国图志》:“设英华书院,凡国中书籍,皆镂版翻译,延华人教其子弟”^⑥;“建英华书院,延华人为师,敬汉文汉语,刊中国经、史、子、集、图经、地志。”^⑦这说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出现不会晚于1842年《海国图志》成书之时。虽然英华书院设立的出发点是为了让英国人学习汉文和翻译中文书籍,但它的出现依然开创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1897年出版的《地球韵言》记载当时的新加坡在福建籍华商陈金钟的慷慨解囊下,有“书院三区,学子居处。中国书院,建额萃英。”^⑧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新加坡华侨华人的谋生方式

在谋生方面,经商是新加坡华侨华人主要从事的工作之一。斌椿在归国后上呈给清政府的考察报告《乘槎笔记》中称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建了一条十余里长的唐人街,仿制洋楼的建筑样式,建造了非常稠密华丽的市场和房屋,包括有烟馆、茶馆和酒肆等。市场里货物云集,而闽粤籍的华商则是当时的众多商人的主力,常年的人数在七八万左右。当时的华人儿童也需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华人会把木头刻成独木舟,华人儿童在船上划桨唱歌,客人会把赏钱掷入海中,儿童们就会跳入海里,随即拿着钱跃出海面。每当洋船来到新加坡时,都会以此作为参观项目之一。“故儿童见舟,皆拍手笑乐,如拾韩嫣弹丸也。”^⑨

生活在新加坡的底层华人,多以娼妓或优伶谋生。在新加坡的大坡(今新加坡河南岸的桥南路一带)的

①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②斌椿:《天外归帆草》,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8页。

③张德彝:《航海述奇》,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90页。

④张荫桓:《三洲日记》,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3页。

⑤王韬:《漫游随录》,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4页。

⑥⑦魏源:《海国图志》卷六,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20页,第221页。

⑧张士瀛:《地球韵言》,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5页。

⑨斌椿:《乘槎笔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8页。

牛车水地区,是华人移民最早聚居的地方。此处的酒楼、戏院、妓院云集,人口稠密,是底层华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又以妓院的数量最多。仅仅注册护卫司的在籍妓女就有3000多人,没有注册的暗娼的人数则不计其数。新加坡的妓女多来自广东,不是年幼时被卖到新加坡,就是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女性。在李钟珏访新期间,新加坡频繁出现从香港贩卖幼女到新为娼的情况。中国驻新领事联合当地华人缙绅向殖民地当局总督进言,于是设置了保良局侦查此事。此事才逐渐平息。新加坡的华人戏院亦有多处,分为男班和女班。演出的剧种有粤剧、潮剧和闽剧等。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前往观看,票价也非常低廉。此地的酒楼数目较少,仅有几间,分别制作粤菜和外国菜。在宴请客人的时候,菜式多为兼顾中西,饮用的酒也多为洋酒。中国酒已不常见,“饮粤东糯米酒等酒者已少,绍兴酒则如琼浆玉液矣。”^①

(四)“猪仔”华工来新与殖民地当局管治华人帮会

早年来到新加坡谋生的华侨华人,多以经商为主。随着新加坡垦荒的需要,大量的“猪仔”华工被贩卖到此。外国人视“猪仔”华工为最低贱的人,经常是对他们实行苦役或是虐待。其惨况不可言状。在李钟珏访新期间,多有来自厦门和香港的轮船搭载数百到上千华人到新加坡。这其中除了自愿出洋者,也有不少被拐卖的人。有甚者还发生过拐卖自己的同母兄弟与同族兄弟。华工到达新加坡后会先投身于客馆,也就是所谓的“猪仔馆”。如果来新华工备有旅费,则不会被虐待。但若是被拐卖至此,就会失去人身自由。在新的华人官绅曾多次建言殖民地当局制止这种行为,但一直没有成功。

来到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多是出身底层,其中不乏违法犯罪的亡命之徒。中国地方官访查确认此情况后,希望中国驻新领事可以向殖民地当局申请将这些罪犯引渡回中国,但被英国人以没有相关条约规定而拒绝。底层华人来到新加坡后,人员逐渐繁多,开始结党立会,拉帮结派。殖民地当局多次明令禁止。但后来还是保存了一个华人帮会(私会党),英国人称之为“危险会”。凡是入会者均要上报护卫司,仅1886年的新入会人数就达6350人,1887年此会的总会员人数达到56200多人^②,可谓是一个势力庞大的社会团体。帮会分子甚至还袭击了当时的华民护卫司毕麒麟,致其重伤。面对日益严重的帮会活动,1889年,时任新加坡总督的史密斯下令禁止所有的私会党。不过华人之间的私斗现象依然偶有发生。

(五)新加坡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关注与支持

虽然新加坡的华人在海外生根发芽已历几世,但对于祖籍国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然十分关注与支持。

1. 赈济祖籍国的灾情

晚清时期的中国自然灾害严重,爆发于1877—1878年的“丁戊奇荒”是这一时期最严重的灾荒。面对祖籍国的重大灾难,南洋的华侨华人,包括新加坡的华侨华人在内纷纷急公好义、施以援手。1878年4月,经当地缙绅、慈善家梁云汉等人的大力募捐后,新加坡、小吕宋等地的华商捐出三万多元,购买米粮以缓解河南的灾情。在新加坡华商的影响下,柔佛苏丹也捐银千元以支援中国^③。新加坡华人绅商因多次赈济祖籍国的灾情而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褒奖。清政府多次嘉奖当地绅商并赏赐花翎,还多次颁发匾额给新加坡的天后庙,既提升了新加坡华人的个人荣誉感,又加强了中新之间的历史传统联系。

2. 在敌后支援祖籍国斗争

1884年8月,中法战争正酣之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掀起了反击法军入侵的战斗。远在南洋的华侨华

^{①②}李钟珏:《新嘉坡风土记》,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3页,第197页。

^③《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七十一,载余定邦、黄重言等:《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马来西亚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7页。

人,包括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也在海外积极支援中国的正义斗争。他们在海面上拦截法国舰船,“充兵毁其械,充匠毁其器,引水搁浅,食置毒物”^①。但因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如果当地华人卷入中法战争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纠纷,最终清政府在英国的压力下宣布南洋华人不得参与中法战争。新加坡华侨华人在敌后的斗争行为反映出中国人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

六、晚清中国与新加坡的官方来往

新加坡作为扼守在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必说。晚清时的中西方交往,新加坡作为中转站,也曾经迎来了多位清廷派出的官员。同治(1862—1874年)、光绪(1875—1908年)年间,中国清朝官员多次到访新加坡,并逐渐建立起中国与新加坡的官方往来。

(一)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置领事及任命领事的纠纷

1876年10月,清朝首任驻英、法大使郭嵩焘(1818—1891年)率领使团造访新加坡,副使刘锡鸿、翻译官张德彝随同到达。同步抵新的还有中国福建水师的“扬武号”兵船。访新期间,郭嵩焘等人会晤了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哲威斯等殖民地当局的高级官员。因新加坡的华人人数众多,尽管殖民地当局已设置了华民政务官进行管理,但有关事宜依然需要与中国磋商解决。因此,此次郭嵩焘访新的其中一项要务是要在新加坡设立中国驻新领事一职。1877年1月,在英国人的压力和郭嵩焘的大力举荐下,新加坡的华人领袖、商界巨头、时任殖民地当局华民政务官的胡璇泽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驻新加坡的第一任领事,负责在新华人的相关事务。胡璇泽是来自于广东番禺的华侨,当时已在新加坡经商、生活了四十多年,在当地极具名声与威信,甚至连外国人也非常看重其威望。他获得了英国授予的勋章,并担任新加坡立法院非官方议员。俄罗斯赐予他男爵爵位,并任命他担任俄罗斯驻新加坡的领事一职。其后,胡璇泽还担任了日本和奥匈帝国驻新加坡的领事一职。胡璇泽一人身兼四国领事,一时传为佳话。但筹建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的过程却一波三折。1878年2月,领事馆正式开办。因清政府未能落实经费,由胡璇泽在当地筹款以资办公,领事馆才勉强得以运作。

胡璇泽一直充任中国驻新加坡领事至1880年3月病逝。领事一职由领事随员苏桂清暂时代理。但英国人对此并不认可,依然希望下一任中国驻新领事需要得到英方的同意。早年因没有中国相关的驻外机构在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人屡遭欺侮。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均感到欣喜。这正是英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新加坡殖民地当局忌讳华人官员的号令,因此对中国驻新领事的工作多加阻挠。加上胡璇泽的英国背景,他在任期间经常听从英国人的意见,有损清政府在新加坡的权益。当时的中国驻新领事仅能管辖新加坡的华人事宜,而其他国家驻新加坡的领事还能兼管满刺加(即马六甲)和槟榔屿的事务。薛福成在其日记中记载:“各国领事皆兼三岛,中国则专司新加坡事,缘设领事之初,忘叙及两岛。然麻六甲、槟榔屿华人有事,亦有来告领事者,但与英官辩论较多周折耳。”^②中国驻新领事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掣肘。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清政府希望可以从中国派出领事前往新加坡任职。中英双方因为这个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外交磋商。最终在中国驻英使臣曾纪泽(1839—1890年)的努力下,英国最终同意清政府可以直接派人到新加坡担任领事。1881年3月,清政府正式任命专业的外交官左秉隆继任领事一职,并于同年9月赴任履新。中国收回了自派领事的权力。

(二)清政府与新加坡殖民当局交涉“猪仔”华工事宜

清政府在新加坡设立领事馆,专门负责在新华侨华人的事务,可见打开国门以后的清政府在逐步改变

^①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四十七,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②薛福成:《薛福成日记》,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页。

过去视海外侨民为“弃民”“莠民”，华侨华人在外国的不幸遭遇为“孽由自作”的传统看法。在海外侨民的政策上，清政府由过去的“概不闻问”逐步变为实施领事保护。其中最能体现清政府保护在新侨民的事件为保障“猪仔”华工的人身安全与待遇问题。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的“猪仔”华工被拐卖至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对外的重要事件之一。在这一时期，也有众多“猪仔”华工被输入新加坡。华工们在新加坡从事最艰苦的开山垦土的工作。1884年，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2年）在与时任中国驻新领事左秉隆讨论在新华工的时候，左秉隆揭露出华工的悲惨境况：“佣工之苦，惨不忍言。每早卯正起至戌初止，不得稍有休息。或有违者，监工人见之，即杖以木棍。每年毙棍下者殆近千人，吾痛恶之。”^①针对华工此等严重受虐状况，左秉隆在任职之初即向表面上拥有新加坡主权的柔佛苏丹和英国殖民地当局发出照会，要求严惩虐待华工的凶手和改善华工的待遇，但均遭到了对方的含糊答复。左秉隆最后向郑观应感叹在不平等条约制约下的“弱国无外交”，贩卖和虐待“猪仔”华工之事无法禁止。可见当时的中国建立近代外交之后的困窘处境。

七、结语

清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中国对于遥远的异域国度——新加坡的了解和接触也是与日俱增。从开国前对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华人对新加坡的垦殖等多方面的相关记载可以看出，此时的清朝虽处于较为封闭的姿态，但对于外部世界也并非一无所知。在开国之后，随着封闭状态的结束，中国人开始注重对世界大势的了解。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主要殖民据点，加上又是华侨华人到南洋地区谋生的重要区域，从具体方位的描述到不同的译名的罗列，从英国殖民当局对新加坡的治理措施到来新华人的族群、文化习俗、谋生方式、当局对“猪仔”华工的管理以及与祖籍国的关系等等，有关新加坡更加详尽的信息被更多的中国人记录下来。与新加坡更多接触的直接结果是使清政府更加明白外交事务和海外侨民的重要性，因此在新加坡开设领事馆处理在新华侨的相关事宜，促进了中国近代外交事业和华侨华人事业的发展。以上种种均构成了中新两国交往史的重要内容，同样也是我国华侨华人的光辉历史之一。

（责任编辑：黄世棉）

Singapore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Historical Data of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Tang Yanchao

(Maoming Dianbai District Communist Party School, Maoming, Guangdong 525400)

Abstract : Since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s contact with the foreign countries gradually increased. Singapore which located in Southeast Asia with an important geographical position became the focus of China's atten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cords of Singapore's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rul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y over Singapor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local overseas Chines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ingapor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bilateral negotiations have become the key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Data; Singapore; Overseas Chinese

^①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7页。